

《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小川陽一著。東京：研文出版，1995年10月10日。406頁。

以日用類書為研究材料，日本學界早開此風。從 50 年代仁井田陞之於法制史研究、酒井忠夫之於教育史探討，到 80 年代以後小川陽一之於文學領域鑽研，乃至 90 年代坂出祥伸之於醫學史探究，日本學者在這方面已有相當成果；然其中，運用範圍最廣、觸及層面最多、研究最深入者，當推小川陽一教授，而本書即為其代表作。

是書除序與跋外，共分四篇十二章。首篇旨在介紹日用類書的由來、性質。第一章說明本書所採用的十種日用類書之基本資料，包括版本、出版者、出版地及大致內容等。第二章則以《文林聚寶萬卷星羅》這部日用類書為例，分析其內容淵源，以明此種資料之雜匯性。本篇篇末並有附錄，乃探索日用類書中有關農務之事，其內容淵源的考證之文。次篇則從酒令切入，考察明清小説在這部分與日用類書的關聯性。該篇共有三章，分別討論《西廂記》、《金瓶梅詞話》、《紅樓夢》三部家喻戶曉文學作品中涉及之酒令內容及其意義。第三篇是全書中討論範圍最廣的一篇，共分四章，廣泛分析相法、剋擇、占卜、求嗣等民間生活普遍行為在明清小説中的表現及其與日用類書之相互印證。第四篇則將重點轉至探究明代小説與善書的關係。首章採取的小說是《三言》、《二拍》，次章則利用《西湖二集》，最後，還對善書中「輕薄」一詞含意加以考證並舉小説實例闡明其義。

對研究明清小説的學者而言，《金瓶梅》、《紅樓夢》、《三言》、《二拍》等文學作品皆非新的研究課題，其相關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是故，如何在前人研究成果上開創新局，是頗令學者困擾的；而小川陽一教授在其著作中即大量運用日用類書、善書等民間普遍而廣泛使用的資料來研究明清小説，將文學與史學加以整合，實另闢蹊徑之作法，而其成果頗令人耳目一新。

由於明清時期，小説、日用類書、善書三者普遍流通，遂啟發作者欲利

用此三種書籍作比對研究。作者立論依據在於：這些資料既大量出現於同一時期，且描述內容乃民間生活之各個面相，故應有其共通性、一致性。在經過仔細比對，深入探討後，本書獲致兩方面的成就：

（一）證實小說中的虛擬世界有其真實社會的內涵。

（二）深入了解小說作者之筆法技巧、構思布局及蘊含深意。

首先，就第一項而言，作者以比對方式證實明清小說深受當時流通民間社會的日用類書及善書的影響，小說中有大量日用類書及善書的內容、思想。如《金瓶梅詞話》第 21 回西門慶、吳月娘等人飲酒作樂的場面，其中所用之酒令可見於《萬用正宗》卷 19 的〈侑觴門〉，而第 60 回西門慶作生意開張大吉，在慶賀酒宴上吳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等人的酒令，則收於《萬用正宗》、《文林廣記》、《博覽全書》、《萬書淵海》等書中。酒令之外，笑話也有相同內容，如同樣第 21 回中應伯爵對桂姐講螃蟹與田雞的笑話，可見於《萬用正宗》卷 37 的〈笑謔門〉，而第 54 回描述清河縣城外的宴會中，應伯爵的兩個笑話〈有錢牛〉與〈江心賦〉，則普遍收於《萬用正宗》、《萬書淵海》、《萬寶全書》、《博覽全書》等書內。

酒令、笑話等遊戲外，民間普遍日常行為如占卜、剋擇、求嗣乃至增進性行為樂趣的服食春藥、使用淫具等，均可在日用類書中尋得相同內容。

除日用類書的大量引用，善書亦在明清小說中隨處可見蹤跡，唯其在小說中的運用較日用類書多樣化，其方式有四：第一是把善書安排在小說可讀的場景中，如《紅樓夢》第 73 回曾提及迎春讀《太上感應篇》，而《西湖二集》則有馬自然勸人讀《太上感應篇》的場景；第二是直接引用善書的文句於小說內，如《初刻拍案驚奇》第 35 卷，窮漢賈仁在東嶽廟祈願的場景，引用了《文昌帝君陰騭文》、《太微仙君功過格》、《自知錄》等書；第三則以善書思想安排人物與情節，如《西湖二集》第 15 卷的陶穀、羅隱，第 8 卷、21 卷、23 卷的放生行為與第 29 卷、33 卷的清廉行為；第四是小說內容採用與善書相同的題材，如《喻世明言》第 34 卷〈李公子救蛇獲稱心〉的故事亦見於《文昌帝君陰騭文》、《昨非菴日纂》、《勸戒全書》、《陰騭文圖說》等書。

由於日用類書、善書均屬當時民間實際利用且普遍流通的書籍，故小說

中的大量出現除可論證三者間的高度關聯性外，還可證實明清小說中的虛擬世界是有其真實社會的內涵。

事實上，透過不同資料的比對，更可深入了解小說作者在創作時的筆法技巧、構思佈局及蘊含深意。如《金瓶梅詞話》第52回，吳月娘要潘金蓮看黃曆挑日子為李瓶兒官哥剃頭，當時潘金蓮選了四月廿一日，認為此日乃「庚戌日，金定婁金狗當值，宜祭祀、官帶、出行、裁衣、沐浴、剃頭、修造、動土，宜用午時，好日期」，故吳月娘即令篋頭的小周兒替官哥剃頭。有趣的是，作者在比對數種明代曆書、日用類書〈剋擇門〉的內容記載後，發現沒有一種書將四月廿一日視為小兒的剃頭吉日，只有以四月的庚戌日、庚戌日前後或四月廿一日前後為小兒的剃頭吉日，更有日用類書如《萬用正宗》、《文林聚寶萬卷星羅》認為四月廿一日非但不是小兒的剃頭吉日，反而是剃頭凶日。故作者以為小說中安排官哥當時被剃幾刀即感不對勁兒，四個月後又因潘金蓮所養寵物白貓雪獅子的驚嚇過度，終致一病而死，只活了一年兩個月，此種佈局可見小說作者巧思，實蘊含深意於其中，更因此刻劃出潘金蓮的陰險凶狠。

相對於潘金蓮的惡，吳月娘的善亦可透過此種資料比對方式而顯現出。如《金瓶梅詞話》第48回，官哥被剃頭的前一個半月左右，因清明節被帶至墳上掃墓，回家後即驚哭不止，李瓶兒慌請吳月娘想法子，吳則令其信任的劉婆子來看，劉婆子看了後認為官哥的病是「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而治療方法是「燒些紙兒，退送退送」，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薄荷燈心湯送下去」，作者將此病症及藥方與日用類書作比對，證明劉婆子所言屬實，此種病症與藥方確是日用類書中所詳載，為民間認同且普遍使用者，甚至《永樂大典》也有相同記載，可見當時官民處方有其一致性。而小說作者的後續安排是官哥病癒，亦符合實情。

類似作者的巧思佈局還可見於酒令、笑話及相法的安排上。如前述《金瓶梅詞話》第21回，酒宴上吳月娘、西門慶、李嬌兒、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孟玉樓等七人先後行令，作者將每個人的酒令加以分析，發現頗符合小說中人物的個性描繪及際遇安排，以潘金蓮為例，其酒令是「鮑老兒，臨老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地個非奸做賊拿」，實指潘金蓮與西門慶密通，

後竟與之共謀，毒殺親夫武大，被西門慶納為五夫人，後又與西門慶女婿私通之劣行。而李瓶兒的酒令是「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牆兒險化作望夫山」，暗喻李瓶兒本西門慶鄰居花子虛妻，因近水樓臺，趁夜呼叫，方便私通，終為西門慶強占為妻。而第 54 回中，應伯爵講〈江心賦〉笑話，內言財主頗富賊形，實是嘲諷山東第一財主西門慶。至於相法構思上，則實例更多，如《三國志演義》中的劉備、張飛、關羽、曹操，《水滸傳》中的宋江、林沖、朱仝，以及《金瓶梅詞話》中的西門慶、李瓶兒等人的容貌敘述，作者均將之與《麻衣相法》、日用類書的〈相法門〉互相比對，再配合小說中人物的個性描述、行為表現，均可見其一致性；以劉備為例，小說中形容其乃「兩耳垂肩」、「雙手過膝」、「面如冠玉」、「唇若塗脂」，具此面相者，相法上言乃「大貴格例」、「天下第一人」，而曹操的「細眼長髯」，則「其心不善」、「其人必惡」、「必是奸雄」。故作者以為這些酒令、笑話、面相的安排已成文學作品中有機的部分，亦小說作者蘊含深意之處。

除上述兩大成就外，本書還有許多作者的發現；如認為日用類書中的酒令製作多採用《論語》、《四書》、《易經》、《千字文》、《蒙求》、《百家姓》、《千家詩》等童蒙著作，然其中亦引用《西廂記》的原因在於，當時許多小說如《水滸傳》、《西廂記》等均為官府所禁，然民間依然流通，且頗受歡迎，故仍將之列入日用類書中酒令製作的材料，由此亦顯現日用類書之民間特性。又小說《金瓶梅詞話》與《紅樓夢》中所引用的酒令，雖很多來自日用類書，然仔細比對可知其間仍有差異，《金瓶梅詞話》幾全借用坊間之已成品，亦即完全取自日用類書中所收錄者，《紅樓夢》則除引自日用類書內的已成品外，還有小說作者的高度創作，此反映兩者層次之不同。又經由研究分析可知，小說與日用類書中提及的求子嗣之藥「壬子丸」，所以稱此名實與陰陽五行有關，因「壬：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壬位北方，時為冬令。陰極陽生。象人懷妊之形」；而「子：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十一月陽氣始生，人承陽以生，故曰孳萌於子」，故服此丸必得男嗣。在占卜研究中，作者解釋了民間避禍用的兩句咒文「赤口上天，白舌入地」，中的「赤口」、「白舌」應指兩種凶神（凶星），故「赤口」

之日或「白舌」之日均為凶日。此外，占卜研究中還發現，鴉鵲鳴並不固定為吉兆或凶兆，須視時、地而有不同，其內容非一成不變。上述種種乃作者努力近二十年，遍採多種民間資料研究的成果，其貢獻頗令人稱道。

當然，本書亦有不盡理想之處，如章節安排上，由於此書實為作者已發表的十篇論文、三個科研計畫的研究報告，再加上二篇未發表的說明補充而成，即其二十年來陸續研究成果之總彙，並非就一本書的整體規劃作完善的章節安排，故讀者在閱讀時會有書名與章節不甚配合、內容重複之感。又在資料徵引上亦有瑕疵，即作者在日用類書的使用上主要有十種，此十種亦為其詳加說明於第一篇第一章，然窺諸其徵引的十種日用類書，全屬明代版本，而使用的小說則包含明、清兩代，此種完全以明代的日用類書資料研究明清時期的小說，似有不妥；事實上，清代的日用類書藏於日本者為數不少，就筆者所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日本國會圖書館、東洋文庫等均藏有不同版本的清代日用類書，作者參考應不困難；此外，作者徵引的十種日用類書中，《學海群玉》實為殘卷，筆者不解的是，作者何以要引用此不全之資料？若以出版時間而言，藏於東京大學的《萬用正宗分類學府全編》，產生時間與《學海群玉》相近，若以內容而言，則《學海群玉》並不比作者所引用的其它九種不同版本的日用類書內容來得豐富，因此，作者實無捨棄完整資料而以殘卷來論證之必要。

雖有以上若干疏失，然瑕不掩瑜，筆者以為該書仍值得肯定與推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論證方式及使用材料的創新。事實上，此書給筆者帶來的省思是：既然文學作品經由善書、日用類書等民間資料的論證可明其內容之真實性，則日後從事民間社會、庶民文化等課題的史學研究，似不必再借助文學作品而該訴諸最直接、最原始的民間材料，如善書、日用類書等；其中，有關善書的研究、利用，早已有學者汲汲經營，並已產生豐碩成果，而日用類書方面，則正是筆者所要努力的目標與方向。

吳蕙芳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